

翻譯面面觀：陳德鴻教授訪談錄

主訪人：單德興

時間：2014年11月27日

地點：香港嶺南大學翻譯系



圖1 陳德鴻教授（左）與主訪人攝於嶺南大學翻譯系。

資料來源：單德興教授。

收件：2015年5月15日

前言

在華人地區的翻譯研究中，香港多年來扮演著領頭羊的角色。陳德鴻（Leo Tak-hung Chan）教授為香港翻譯研究資深學者，任教於嶺南大學多年，目前擔任該校翻譯系系主任暨香港翻譯學會（Hong Kong Translation Society）會長，並主編中英雙語之《翻譯季刊》（*Translation Quarterly*）。陳教授早年於香港大學攻讀英國文學，之後前往美國印第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攻讀中國文學，取得碩士與博士學位，返回香港後從事翻譯研究。陳教授的研究領域為英語教學、現代主義文學、西方漢學、日本通俗文化，並以翻譯研究一以貫之。其研究成果發表於香港、臺灣、中國、日本、韓國、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法國、比利時、丹麥、匈牙利、西班牙、土耳其等地的學術期刊，並著有《中文翻譯小說的讀者、閱讀與接受》（*Readers, Reading and Reception of Translated Fiction in Chinese*）等書，編輯或合編多種期刊專號與專書，包括與劉靖之合編之《蛻變中的中國翻譯研究》，與張南峰編譯之《西方翻譯理論精選》，影響深遠。

陳教授的教學內容及方式與時俱進，晚近並將視覺研究融入教學中，活潑生動，頗能提升學習興趣。嶺南大學翻譯系在最近全港的學術評鑑中獲得最多「世界級」的評分，殊為難得。此外，身為香港翻譯學會會長的他，積極推動相關活動，既著重於學術之提升，也致力於學術與社會之結合，增進一般市民對於翻譯的認知與興趣。總之，在研究、教學、學術行政與專業服務上，陳教授都是當今香港翻譯界的代表人物。

主訪人利用在嶺南大學翻譯系訪問研究之便，於系主任辦公室與陳教授進行訪談，內容廣泛，除了其教育背景、學思歷程、翻譯研究、翻譯教學、專業服務之外，並就兩岸三地的翻譯研究以及東西翻譯學界的互動等議題表示個人的見解。主訪人事先整理出兩整頁的訪談大要，陳

教授審慎行事，先傳來四頁的英文書面答覆，訪談時又針對訪談大要及主訪人的後續問題加以回答，前後超過兩小時。主訪人除了將錄音檔經由雲端傳給在臺灣的黃碧儀小姐謄打，也將四頁的英文答覆譯成中文，併入謄打稿。陳教授在百忙中以手寫方式在列印稿上大幅修訂，掃描稿傳回臺灣，於檔案中修訂，經主訪人進一步編輯，加上小標題，由陳教授第二度仔細修訂，於二〇一五年五月上旬傳回，幾經電郵討論，終於定稿。全篇訪談為臺灣學者針對一位香港資深翻譯學者的訪談，藉由雙方的對話與交流，提供香港在翻譯研究與實務方面的經驗，可為華人世界的重要借鏡。

正文

一、教育背景

單德興（以下簡稱「單」）：你在香港不僅從事翻譯的研究、教學，也負責學術行政事務與翻譯學會，在多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也有豐富的經驗。首先能不能請你談談自己的教育背景？

陳德鴻（以下簡稱「陳」）：我原來是唸英國文學的，去了美國後唸了東亞研究和中國研究。所以我的背景一部分是中國文化，一部分是英美文化，配合起來做翻譯是最適合不過的，多年來我就從事翻譯教學以及研究。

一九八〇年代我在香港中文大學修讀了一個高級翻譯文憑學程，老師是港臺最優秀的譯者：宋淇、思果、余光中、鍾玲、李達三等。他們以身作則，就像師父教徒弟一樣。

單：巧合的是，余光中和李達三兩位老師在去香港之前，在臺灣也教過我，余老師在國立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教我英國文學史，李老師在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研究所教我研究方法與書目學，各有特色，讓我受益良多。至於你提到的宋淇和思果，我唸書的時候也都讀過他們討論翻

譯的作品，尤其思果的《翻譯研究》在大學四年之間更是細讀過七遍，打下翻譯的基礎。

陳：你是余光中、李達三老師的入門弟子，當時宋淇在香港特別開創了一個兩年的翻譯兼讀課程。那時候沒有翻譯的學士學位，雙語研究的學位也沒有。

單：那是哪一年？

陳：應該是一九八一到八二年，我是第二屆的學生，同學裡有何偉傑等人，接下來還辦了幾屆，後來香港就開始有翻譯學士課程了。

單：那時候你是教育署英文科的視學官。你是怎麼成為視學官的？怎麼會對翻譯有那麼濃厚的興趣？

陳：大學畢業後，我在教育署裡擔任助理教育主任，同時又出版了幾本頗受歡迎的英語教科書，所以不久便轉了職成為助理視學官，負責英文科的教學評鑑，以及舉辦教師培訓班。不過，從那時開始到現在，我一直有點抗拒英語教學中流行的一些設計和理念。我最近寫了一些文章，反對溝通式的（communicative）英語教學法，也質疑現行英語教學背後的理論根據。

單：那是因為所謂的溝通式教學法其實只是著重於單向的灌輸，認為學習者原本的語言與文化會形成學習外語的障疑，而不是像翻譯這樣從根本上就重視雙方的溝通與交流。因此，你在香港求學時就留意中英雙語的相關問題，這跟你後來到國外唸中國文學有關嗎？

陳：中學時我們讀英國文學，翻譯作為一個學科並不存在，很自然地大學就主修英文，沒有太多其他的選擇，但英國文學以外的世界很遼闊，在大學畢業後我就轉了向，改為研究中國文學，再下去的便是翻譯了。

單：你轉到中國文學時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或挑戰？或申請學校時有沒有遇到什麼挫折？

陳：還好。我們那個年代在美國的中國學生不多，我進入了印第安

那大學東亞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發現老師們對中國學生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在印大的那幾年學習得很暢快。那個年代跟現在不同，整個東亞系就只有我們幾個中、港、臺的學生。東亞系的漢學家很照顧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交往，老師會邀請我們到家裡參加他們的派對。當然在美國大學也有一些中國老師，但最關心我們的卻是那些本身就很仰慕中國文化的外國漢學家。對我來說，這是個很難忘的經驗。

單：印第安那大學的比較文學很強。你也接受過那方面的訓練嗎？

陳：我主修中國文學，副修宗教研究，所以唸的宗教課比較多。過程中我發現宗教跟文化關係很密切，通過宗教更能了解文化。比較文學方面的老師當然就是我的博導歐陽楨（Eugene Chen Eoyang）教授。



圖2 陳德鴻教授。

資料來源：陳德鴻教授。

二、進入翻譯研究

單：你的興趣很廣泛，有強烈的好奇心，常常探索不同的領域，後來是怎麼決定集中在翻譯研究的？

陳：事實上也是因緣際會。在香港翻譯方面的工作機會很多，能教翻譯的人也很少，所以我申請教職馬上就獲聘。還沒唸完博士時我已經在香港城市大學教過翻譯，畢業後回港就到嶺南大學教翻譯。翻譯圈裡一直很缺乏合適的老師以及翻譯研究人員。九〇年代初是這樣，今天也一樣。差不多每一年我們大學都有空缺，但從應徵者的履歷看來，理想的人卻寥寥無幾。開始教翻譯以後我漸漸發現，翻譯研究不是外間所說的索然無味。剛開始時我做了一些資料性的工作，十幾二十年下來，就開始去思考翻譯在我們這個時代裡究竟意義何在？為什麼要做翻譯？可發掘的研究題材多得不可勝數。

單：你申請嶺南大學的教職時，香港的翻譯學術發展跟你最先攻讀翻譯文憑時相比，是不是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發展得更為成熟？

陳：是的，那已經是一九九〇年代了。其實嶺南是最早提供翻譯學位課程的大學之一，接著幾乎每所大學都開了學士課程。若從八〇年代末算起，嶺南大學的翻譯系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

單：你跟嶺南大學的同事張南峰編譯的《西方翻譯理論精選》（*Masterpieces of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二〇〇〇年由香港城市大學出版，可說是原汁原味的翻譯，每篇之前並附有你們撰寫的導讀。以那本書出版的時空環境判斷，對於翻譯研究在華文世界的發展應該發揮了蠻大的影響力。我的印象是出版社相當積極促銷，連在臺灣的我都接到贈書，覺得很意外。

陳：我們在二〇〇〇年合編的那本選集，據知在香港、臺灣和大陸都有不少大學的翻譯學程採用作為教科書。它是從幾個不同角度有系統地向華文世界引進西方翻譯理論的第一部文集，涉及語言學、語文學、詮釋學、解構學、目的論等等。目前的博士班學生幾乎很少人沒有讀過這本書或其中若干篇章。這個計畫是我倡議的，而且從大學拿到資助。香港許多的翻譯學者，像謝聰、商承禹、黃國彬、吳兆朋等人，都分別譯出了部分材料。

至於實際上有多大影響，我還不太清楚。但是有時候聽大陸唸翻譯的研究生說，他們都讀過這本書。實際賣了多少本我們不知道，我們當時也沒有要求拿版稅，因為那個計畫是由學校資助的，二十位老師一人翻一篇，也不知道拿了版稅回來該怎麼分。所以我跟南峰就決定不要版稅了。

單：你們當初決定編這本書的動機如何？當時的情境又如何？

陳：那時我們一起教一門翻譯理論的課，我就提議一起編一本書，因為當時主要的西方翻譯理論還沒有譯成中文，結集成書。

單：其中涉及的選文和尋找譯者這整個文化生產的過程也不容易。

陳：當年還沒有那麼多的選擇，這可能也是較現在容易辦的原因之一。當年可選的就是韋紐堤（Lawrence Venuti）、史泰納（George Steiner）等幾個有代表性的理論家。現在就不同了，理論五花八門。像近年貝克（Mona Baker）編了一本有關翻譯研究的選集，羅列了好幾十篇必讀的文章。我們那個年代沒有那麼多選擇，所以選擇的過程中沒有什麼困難，取得版權也容易。

總之，我覺得以整個社會環境來說，在香港做翻譯研究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所以我也很自然就走了這條路，沒有再鑽研英國文學。

三、個人研究

單：能不能談談你個人的研究情況？

陳：我個人的研究包括四個板塊，英語教學、現代主義文學、西方漢學、日本通俗文化，而貫穿它們的是翻譯研究。說到研究方向的確立，重要的是把其他學科的東西運用到翻譯研究上，並加以整合。

單：就語言學習而言，你認為根據我們的背景，以翻譯的角度切入英語教學是有利的途徑嗎？

陳：這牽涉到英語全球化的問題。理論上，從事翻譯的人應該對英語的全球化持有獨特的看法。但事實上沒有幾個學者站在翻譯的立場來審視英語的全球化。我剛出版的論文，“Under the Shadow of Three *Lingua Francae*: Repositioning Translation in East Asia”（〈在三個共通語的陰影下：談東亞翻譯的前景〉），關切的就是西方所推崇的全球和普世的觀念在個別地方，如東亞，究竟如何能實現。難得的是，英美國家從事英語教學的人也能接受我的說法，願意刊登我寫的多篇「反英語化」（anti-Englishization）的文章，而我的立場跟主流意見很不一樣。

此外，這些年來我也出版了一些翻譯研究的專書。最新出版的一本談到讀者反應理論與翻譯的關係，書名是 *Readers, Reading and Reception of Translated Fiction in Chinese*（《中文翻譯小說的讀者、閱讀與接受》），撰

寫時就希望它可以提供有關這個課題的「最全面的方法論」。在翻譯領域中這個主題是關鍵性的，卻沒有太多討論，真是讓人驚異。翻譯如何影響讀者？晚近有很多專著探討閱讀品味的變遷（如 Jonathan Rose）、同人小說（日文稱為同人誌）、同人翻譯、同人漫畫的閱讀與創作（如 Minako O'Hagan），以及讀書會（如 Elizabeth Long 和 Janice Radway）等等。我們可以從這些接受的角度來研究意義如何跨越語言和文化而流傳。

在 *20th Century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y: Modes, Issues, Debates*（《二十世紀中文翻譯理論：模式、課題與爭議》）一書中，我重讀了由嚴復、魯迅、錢鍾書、傅雷、劉宓慶等人所談到的中國翻譯理論，比較了中西方的翻譯理論觀念（現代的、後現代的、解構主義的），最後反思了九〇年代在香港的「翻譯研究轉向」。其實，香港正是把西方翻譯理論引介到華文世界的渠道。

我編的另一本論文集 *One into Many: Transl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從單一到多元：中華文學經典的翻譯與傳播》），整理的是中國經典文學翻譯成為非西方語言（如韓語）或英語以外的西方語言（如荷蘭語）的具體情況。非英語翻譯所扮演的角色在現今這個英文全球化的時代被低估了，德國人的翻譯作品就是一例。依我之見，德國和法國漢學家為中國古典文學的傳播作出了可觀的貢獻。

單：你通曉中、英、日、法四種語言，而且實際從事過中翻英、英翻中、日翻中。我記得你曾向我提過，兩岸三地的翻譯研究主要著重於中英互譯，但是亞洲語言之間的翻譯研究卻很少。

陳：的確如此。所以最近我專注研究中日翻譯和日本漫畫。中日的翻譯關係逼使我們重新思考西方的一些翻譯觀點。有趣的是，一些不諳英語的學者，如金文京，已經發表了一些有突破性的作品，闡釋了中日韓的文化和文字因緣，很少人像他著力如此之深，但是西方翻譯研究者對他的研究卻一無所知。

從事翻譯研究的人與從事文學批評、歷史研究的人相比，本來就比較少，研究亞洲國家之間翻譯關係的人就更少了。中國大陸有些學者研究中日關係史和比較文學屢有突破，但採用的並不是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的角度。日本漢學家也從事日中關係研究，但沒有運用翻譯的概念來分析一些具體情況，很多只是列舉史實，如哪一年出版了什麼譯本，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出現的，諸如此類。我們能否用一個翻譯研究的視角（如語言學派、操縱學派、目的論學派、解構學派等）來審視中日韓的翻譯關係呢？臺灣學界事實上有很大的潛力，因為很多學者都懂日文，應該可以像楊承淑一樣在這方面作出貢獻。我覺得從過去和現在來看，東亞的情況都跟西方很不一樣，引入西方那一套研究方法會帶來不少的衝擊。

單：是的，臺灣被日本殖民五十年，要完整地討論臺灣翻譯史是不可能把日據時期排除在外的。

陳：最近的十年間，臺大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出版了一系列專著，對中日翻譯關係的研究很有裨益。雖然中日翻譯關係並不是它們的重點，但針對諸如日本的漢學史等課題，它們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資料。我看過其中好幾本。

單：是資料性的？還是理論或方法論的？

陳：我看的那幾本都不只提供資料，更多的是從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研究中日關係，不落俗套。我從中學了很多東西。我今年在英國出版的一篇文章談論到竹內好如何翻譯魯迅，就是從那一系列的書裡得到了一些靈感。¹

單：從研究中日翻譯關係到你最近研究日本漫畫，這不僅是語際

¹ 參閱〈日本化與魯迅的《狂人日記》：從三個維度看竹內好的翻譯哲學〉（“Japanization and the Chinese ‘Madman’: Triangulating Takeuchi Yoshimi’s Philosophy of Translation”），文刊 *Translation Studies* 8 (2015): 1-16。

翻譯（inter-lingual translation），而且進入了符際翻譯（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的層面。能否談談你如何有這種熱忱？

陳：事實上我自己沒有那麼熱愛漫畫，但翻譯研究是無法不跟著時代而演變的。英美經典文學翻譯的研究固然有一個傳統，從經典翻譯裡也可以不斷發掘出新的東西，但「流行文化產物」的重要性已得到我們這時代的確定，也是現時大眾最有興趣的東西。再者，做翻譯研究要有動力，英美現代主義文學的中譯跟我們實際生活有那麼強的聯繫嗎？現在流行的漫畫年輕人都熟悉，在我們學生中影響力之大真是不言而喻。我覺得可以從翻譯的角色切入，把漫畫作為文化翻譯的例子。我在日本出版的一篇論文就是關於《花樣男子》在東亞各地的多個改編版本。²

單：你目前手邊正在進行什麼工作？

陳：我正在為 *A World Atlas of Translation*（《世界翻譯地圖》）撰寫〈翻譯在中國〉（“Translation in China”）的專章，這本書是由兩位歐洲翻譯學者——甘碧兒（Yves Gambier）和斯德康尼（Ubaldo Stecconi）合編的。我也正在完成兩篇關於過去五十年來日本漫畫家如何改編《西遊記》的文章，有很多匪夷所思的題材：玄奘被改寫成女子、師徒四人開著跑車四處破案、孫悟空變成機器人、玄奘愛上了佛教羅漢。

單：身為一位資深學者，能不能請你分享一些多年的心得？

陳：以前我們讀書時沒有機會接觸方方面面的東西，都局限在個別的學科之內，不是只要對繪畫有興趣就可以去修讀美術史的課程，這種情形反映在研究上面，就是很多人的研究範圍都變得狹窄。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跨學科研究是潮流，而翻譯研究是跨學科的。

以前年輕時方向沒有看清楚，跟著別人做一些「熱門」話題，甚

² 參閱〈千變萬化的《花樣男子》：東亞的跨國改編與全球化論述〉（“Janus-faced *Hana yori dango*: Transnational Adaptations in East Asia and the Globalization Thesis”），文刊 *Asian Cultural Studies* 40 (2014): 61-77。

至不知不覺跟隨了西方一些翻譯研究期刊設下的「無形議程」(hidden agenda)。所有的研究期刊都有自己的立場，年輕學者跟著刊登出來的文章來做研究，也就間接做了代言人。現在我盡量投稿給不同的外國期刊。當然，它們的議程也是隨時代而變的。

四、翻譯教學

單：就翻譯教學而言，你教授的課程分成幾大類，有語文、文學、文化、翻譯理論，並且用翻譯研究來貫穿它們。請問你如何結合翻譯研究與教學？

陳：事實上，翻譯研究在我的活動範圍內是中心。以前我沒有這樣想，進了翻譯系以後，慢慢地做了一些相關研究，回頭再看，逐漸發現了工作的重點。一般翻譯理論太著重標準、技巧的問題，應該從更寬廣的視角來看翻譯，而且對於所使用的方法論要自我反思。翻譯與外語學習有什麼關係？翻譯在東西關係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在英文成為全球溝通語言的時代，翻譯的意義何在？在即將發表於澳洲的《翻譯與口譯》(*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期刊的文章〈後溝通時代的英語教學〉(“Post-Communicative Pedagogies”) 裡，我質疑一個多世紀以來廣泛推行的溝通式教學法(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那種方法始於一八八〇年代德國的改革運動，多年來公推為最好的英語教學法，而有更長遠歷史的翻譯式教學法(the Translation Approach) 卻被排斥。

儘管翻譯研究有三十多年的歷史，推崇的人也為數不少，但對它的重要性很多人還是一知半解。英語世界以語言手段對外國文化的進攻日趨嚴峻，只有翻譯能充當一個對抗的手段。翻譯研究提供了一種獨特的角度，讓大家體認到文化不是單一的。翻譯研究有趣的地方是，它永遠是建基在二元論上。翻譯本身就是二元的運作(binary operation)，涉及兩個語言、兩種文化。不單做翻譯時要有二元的想法，我們研究翻譯時也要採用二元的策略，譯者、譯文讀者都活在兩個不同的文化中，同

時有兩種不同的生活態度。兩週前我去廣州中山大學演講，題目是「英語全球化」，結束之後有一位年輕的英語老師問我，知不知道巴別塔的神話：人類要建一座上達天庭的高塔，上帝不要他們得逞，於是讓他們講不同的語言，不能互相溝通。她興奮地說，現在我們雖然說不同的語言，不過如果大家都學好英文，不就有了一個解決溝通問題的途徑嗎？我說，這種想法錯了，只是以「單一」的態度看問題。其實全球英語（Global English）不是解決的方法，翻譯才是，因為翻譯提供了眾多語言之間的通路。我這麼說她就懂了，因為她雖然主要教英文，但也常做翻譯。大部分的人都不覺得提倡全球英語有什麼問題。但是我要強調，翻譯的好處在於它強調二元對立，永遠提供一個二元的方式，迫使我們走中間的路，不走極端。雖然文學、哲學都可以選擇二元論述，但翻譯卻是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下這樣運作的。它甚至是多元的（multiple），世界上有那麼多語言，應該都有同等的地位，為什麼要給英語一個超然、獨尊的地位？我覺得翻譯研究是個看問題的方法，就好像女性主義一樣。女性主義不單只著眼於指出男人的不是、推翻男權，強調以前沒有發現的女性優點，而男人以強權把她們壓制了。更重要的是，女性主義提供了另外一個視角，讓我們重新審視我們思想上的偏差、重新窺看我們的世界。它是一個另類選擇（alternative option）。很多人可能不覺得翻譯研究有那麼重要，其實不然。這當然是理論上的發揮，跟實踐沒有直接的關係。

單：你把個人的研究興趣與教學結合。記得上次你給我看的那兩個影片就是根據希區考克（Alfred Hitchcock）的電影重拍的。你把視覺藝術帶入課堂教學，學生的反應如何？

陳：現在的學生生活在一個視覺（visual）的年代，純文字（verbal）的年代結束了，你要求他們去看三、五百頁的小說根本不合時宜，即使是流行小說都沒有耐性去看，但是電影、漫畫就不同。大概從十年前開始，我們就進入了視覺的年代，在新的世界裡面，大家上

網、看臉書，沉醉於漫畫、電影。我以前做文學研究，但現在還沉迷於文學的人減少了很多。即使你在舊題材上再有什麼新知卓見，影響力依然有限，只要看看圖書館書架上有關電影、視覺藝術的專著，你就知道研究方向有多劇烈的改變。

單：你對視覺方面的興趣一方面是跟上時代、學生的興趣，另一方面其實與你個人的研究興趣有關，如你對現代主義的興趣、對畫家的興趣。

陳：的確是有一點聯繫。我蠻喜歡視覺藝術。

單：翻譯系的學生很多是為了把中、英文學好，以便將來能找份好的工作。在教學設計上，你如何提升他們的語言能力和職場競爭力？

陳：要提升學生的語言能力其實還容易，進行中英雙語訓練，比講解理論容易得多。很可惜的是，現在的學生英文程度不高，文法錯誤比比皆是。英語水平不夠，翻譯水準當然受到影響，更別說掌握翻譯理論，把它運用在日常的翻譯工作中了。基本上，理論課主要是為了要唸碩、博士班的學生而設的。我們的畢業生只有不到百分之十從事翻譯，大多進入其他行業，做公關、教師等，教翻譯的甚至完全沒有。所以我覺得老師要做的並不是培養他們成為優秀的譯者，而是提升他們的中、英文水準。也就是說，我們也兼做中文系、英文系語言教學的事，只是做的比較巧妙一點，把中、英語言訓練變得更趣味化。嶺南的翻譯系是非常受學生歡迎的，在文學院各個主修中被最多學生選為第一志願，比最弱的學系多出十多倍。

單：請問系裡本科生的來源如何？碩士班與博士班的學生來源又如何？

陳：我們的本科生都是剛從中學畢業，沒唸過翻譯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則大多是從國內來的。

單：面對本科生要如何使學習更趣味化？

陳：我現在教的那門課「文學、文化、翻譯」，不單要學生做多個翻譯習作，還要他們先看完小說以及改編的電影，然後討論並分析小說的主題，又要做中、英文的口頭報告。比如希區考克的《觸目驚

心》(Psycho) (編按：臺灣翻成《驚魂記》)，同學們做了口頭報告之後，就對作品很熟了，於是在翻譯一段文字時，他們就會發現其中有很多細微的地方都需要運用對整個作品的理解才能翻出，如果沒有看過原著和電影，就不知道個別句子的含意。比如說，女主角說她頭疼要吃鎮靜劑，如果沒看過整個故事，就不知道她為什麼說：「頭疼就好像下決心一樣，一不頭疼就沒有這個決心了。」大概是這個意思，不過單看英文原文字面意思，卻是不清不白的。這麼一來，語言訓練就變得有趣味了。又如描述兩個同事在辦公室聊天，老闆進來，逗她們說：“This place is hot as fresh milk.”有學生就直譯為：「這個地方好像鮮奶那麼熱！」其實大家都知道，鮮奶不熱，超級市場賣的都是冰的。但是《觸目驚心》的背景是美國德州，老闆說的是從母牛身上剛擠出來的奶，所以是燙的。那句要譯為：「這個地方好像剛擠出來的牛奶那麼熱！」這就是我所說的巧妙。教授理論研究，學生不一定覺得有用。實際做翻譯，學生的英文又不濟。我們就在教學上添加一些趣味，通過那些習作讓他們感覺到語言，尤其是文學裡面用的語言的奧妙。文學語言是活潑生動的，而不只是一堆文字而已。我這門課學生們還蠻喜歡的。

單：從你舉的例子就可以看出，翻譯不只涉及語言，還有文本的細讀……

陳：還有脈絡，即整個社會背景，也包含地理，像上面這個例子就涉及美國南部的生活。這樣配合著教翻譯，當然也就教了一點文學、文化的東西。

單：從學生的回饋中，有沒有提到在修你的課之後對翻譯的體會或感受有什麼不一樣？

陳：有一個學生在給老師的匿名評量裡說，原以為翻譯很悶，但是修過我們的課之後，發現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學到的東西五花八門，非常謝謝我們系裡的老師。

單：你多年擔任嶺南大學翻譯系系主任，而貴系在最近全港的學術

評鑑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中獲得最多「世界級」(即三、四星) 的評分，殊為難得。能不能請你談談貴系的特色？

陳：我們的課程特別強調翻譯與文化之間的互動。自從去年四年制學士課程開始以後，學生可以自由地從兩大類課程中選課。一類訓練各個領域中的英漢翻譯技巧，另一類則提供各種文化和文學的知識。

五、翻譯實務及其作用

單：就翻譯實務而言，你自己也做了一些中文英譯的工作。

陳：我翻譯了《閱微草堂筆記》中的幾十個故事，還有清朝一些文言小說，像是袁枚的《子不語》。

單：上次我們一起在香港中文大學聽演講時碰到卜立德 (David E. Pollard)，你提到希望能和他就《閱微草堂筆記》的翻譯交換心得。劉紹銘教授曾提過，卜立德、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詹納爾 (W. J. F. Jenner) 三人的英文翻譯有如 stylist (文體家)，「有個性、有氣派、有文采」。你覺得這幾位英文母語譯者的譯文有什麼特色？

陳：他們的譯文都各自精采，就讓譯評家去判斷吧。為了教課的緣故，我看過葛浩文翻譯的一些段落。而卜立德英譯的《聊齋誌異》去年才出版，我還沒有看過。翻譯的實踐我做得不多。在我看來，有一批人主攻實踐，另一批人則主攻研究。對我來說，翻譯本身提供了語言服務，譯者是提供語言服務的人 (language service providers)，讓不懂外語的人能了解用外語寫的東西。就此推論，把一篇文學作品翻譯成外語，意義在哪裡？文學的精采之處就在語言，讀者為什麼不把英文學好去看勞倫斯 (D. H. Lawrence) 的原作，而要去看譯作？李歐梵就強調過，文學是要用原文來教的。比如說，要了解德國文學就要先學好德文。譯者花那麼多精力去把文學作品翻成中文，卻不一定能像錢鍾書所說的，能直接吸引讀者去看原文。譯文應該被視為一個獨立的存在，那會更有意思。

單：前些日子我去香港科技大學聽大陸作家閻連科演講，他提到一些俄國作家以及西班牙文作家馬奎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其實以他的外文能力是沒有辦法讀俄文作家或西班牙文作家的原文作品。先前在嶺南大學時，我私下詢問當時的駐校作家蘇童，他早期的作品是否受到馬奎斯的魔幻寫實主義的影響，他也坦言不諱。因此，翻譯文學作品應該還是有些實際的作用。另一方面，莫言的作品若不是有多種外語譯本，他的名聲和影響力也不至於那麼廣。

陳：這個也合理，只是要說到譯本的接受情況，真是半天也說不完的。關於中書外譯的問題，之前羅選民在嶺南大學演講時就問：《大中華文庫》是為誰翻譯的？記得前年在上海復旦大學翻譯中心成立的典禮上，大家也討論到這個問題，謝天振就直接了當地說：「從銷售量來看，看過這些翻譯的外國人寥寥可數。」

單：對我個人來說，將來有時間很想再多讀些俄國文學，但又不可能抽出時間去學俄文。若能找到可靠的中譯本，就想純粹去閱讀、感受文學作品本身，而不是為了學術研究。

陳：我也相信有些讀者真的很喜歡看翻譯文學。我不否認。我自己年輕的時候第一本看完的長篇小說就是 *Wuthering Heights*（《咆哮山莊》）的中譯。

單：記得是誰翻的嗎？

陳：不記得了，一定是六〇、七〇年代最有名的譯者。所以我並不是說中譯文學作品完全沒有價值。像年輕人英文還不夠好，大概還是依靠中譯來接觸外國文學。相對之下，非文學作品很多不能不翻，政府公文、法律條文就是最佳例子，但是文學翻譯則另當別論。

六、專業組織

單：另一個對翻譯研究與教學發揮作用的因素就是專業組織，請問香港翻譯學會當初是在哪種情況下成立的？

陳：香港翻譯學會於一九七一年成立，跟宋淇等一班核心人物有很大的關係。其實宋淇在香港的翻譯史和課程發展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是學會的發起人之一，除了宋淇之外，還有孫述宇、孫述憲（不知他們是否屬於臺灣背景）、金庸以及賴恬昌。賴恬昌當年是中文大學校外課程部主任，他從事翻譯，也用英文寫了一系列介紹中國文化的書。翻譯學會到二〇一六年就四十五歲了，在香港學術團體中算是歷史悠久的了。在七〇、八〇年代翻譯並不發達，學會在當時發揮了多方面的功能，例如推廣翻譯，鼓吹翻譯專業化等等。而現在翻譯在香港如此蓬勃，學會的目標跟七〇、八〇年代自然就不同了。

前兩年中國大陸的大學一下子就增加了一百多個翻譯和傳譯的碩士點。所以我們需要思考香港這時該做的是什麼？臺灣以前只有輔仁大學有翻譯研究所，但這幾年多所大學也增設了翻譯系。

單：臺灣師範大學的翻譯研究所還設立了博士班，培養出了一些翻譯學的博士。

陳：兩岸三地這麼多年來已經訓練了很多翻譯博士、碩士，其中有不少都可以獨當一面，在大學裡做研究、教翻譯。在這樣精英輩出的情況下，香港翻譯學會最近也一直在思考新的發展方向。

單：現在有多少會員？

陳：正式名冊上有四百多位，其中很多是七〇、八〇年代就已經加入學會的，那個時代沒有電郵，所以很多會員後來失去聯絡，有些也已經移民了。我這一代的翻譯人當年差不多全都加入了學會，另外不少會員是政府單位中的翻譯人員。至於年輕一代，我們還需要積極吸收，這是另一個以後要努力的方向。

單：是指新的學生會員？

陳：對的。有學生入會的話就成為學生會員。因為我們是一個專業組織，申請加入學會時需要繳交履歷、文憑副本，然後經過學會的審核。起初我也有一個錯覺，以為申請人只要繳交了會費就能入會，就像

亞洲研究學會和很多同類的學會一樣。其實，有些人申請入會，卻未獲批准。這也是會員人數多年來沒有大量增加的原因之一。而且到目前為止，我們只收香港的居民為會員，少數的臺灣或海外會員是以前在香港居住的時候就已經加入的。現在若是海外人士加入，只稱附屬會員，沒有投票權。

單：你提到香港的翻譯史以及宋淇扮演的角色。最近他兒子宋以朗出版了《宋淇傳奇——從宋春舫到張愛玲》，整本書集中於與宋淇相關的人物，涉及翻譯的部分很少。其實，不管是從翻譯史的角度，或者從學術機構、學會和期刊 *Renditions*（《譯叢》）的角度來看，宋淇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陳：我知道有幾位年輕學者在做香港翻譯史的研究，嶺南大學的張宇傑就是，他研究的是思果的翻譯。

單：有人寫過香港的翻譯史嗎？

陳：沒有。但是香港翻譯學會前會長劉靖之曾寫了一本翻譯學會的歷史，有數百頁，一共出了兩版。它應該是香港翻譯史裡重要的一章。

單：你個人在二〇一〇年接任會長後，有沒有提供什麼特別的服務？

陳：我們每年籌劃全港青年筆譯比賽，與公立圖書館在香港各區合辦公開演講，又成立獎項來鼓勵年輕譯者，最近三年還與商務印書館合辦多次的講座。從這些活動中我發覺翻譯總是有它作為實務的一面，而從活動的參加人數看得到市民大眾對翻譯的興趣遠比想像中濃厚。

去年秋天的一系列公立圖書館演講中，我們邀請外國翻譯老師（如浸會大學的倪若誠〔Robert Neather〕）講述他們在中譯英時遭遇到的有趣經驗。一直以來，我們希望把翻譯的性質，或者翻譯這個職業，介紹給一般市民，作為一種推廣。這個系列已經舉辦了六、七年。至於和商務印書館合辦的講座是配合新書的出版。我們請作者來介紹他們的作品，基本上是新書發表會。

學會也提供了就業的資訊，做媒合的平臺，利用臉書把一些跟翻譯有關的消息傳播出去。我們轉載私人公司徵才啟事，讓會員、自由譯者都可以利用這些機會。這等於是一個交流的平臺。不過設立網站傳遞這類訊息牽涉到一些法律的問題。譬如說，私人公司透過我們的網站找到譯員，卻不滿意他們的表現，或者其他狀況出現了，中介人是不是也需要負法律責任？翻譯學會的法律顧問幫我們解決了一些問題，我們才放膽去做。以前是想做什麼就去做，但現在情況不同了，一切都講求合法，所以在推展業務時反而有點戰戰兢兢的感覺。

單：你主編的學會刊物《翻譯季刊》得到外界的支持，像培華教育基金會(Pei Hua Education Foundation)就曾捐助。

陳：我們算是建立了一段紀錄，二十年間出版了七十五期，現在可以在全球的資料庫線上閱讀《翻譯季刊》，在中英翻譯研究的期刊中我們確實開了先河。

單：《翻譯季刊》的投稿要求與審查過程如何？

陳：我們跟同類期刊有點不一樣，就是要求中文文章要超過十六頁或八千字，原因只有一個：較長的文章可以給予作者更大的篇幅來更深入地探討問題。

單：臺灣專責翻譯的機構以往是國立編譯館，現在改制為國家教育研究院底下的編譯發展中心，發行《編譯論叢》，但至今只有幾年。這份期刊是公家單位發行的，重視學術品質，審查作業仔細。另外，台灣翻譯學學會也出版年刊《翻譯學研究集刊》，主要是書林出版社在支持。

陳：是的，我也在那裡發表過一篇百多頁的二十世紀現代英詩中譯的書目〈二十世紀英美現代派詩作中譯本經眼錄〉。難得的是，篇幅那麼長的文章他們照登。



圖3 2011年11月賴恬昌先生九十大壽餐會。前排左起：黎翠珍、余丹、陳潔瑩、賴恬昌、劉靖之、金聖華；後排左起：潘漢光、黃紹顏、黃國彬、陳德鴻、何信勤、王淩、羅志雄、劉勇強、朱志瑜。

資料來源：陳德鴻教授。

七、兩岸三地的翻譯研究

單：先前提到你和張南峰編譯的《西方翻譯理論精選》在華文世界發揮了很大的影響。那本書選譯了霍姆斯的《翻譯研究名與實》（James S. Holmes, “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1972），一般公認那篇文章為翻譯研究這個學科奠定基礎，那是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事。已故的浸會大學教授張佩瑤（Martha P. Y. Cheung）曾在文章中提到她從事翻譯研究的歷程，她的背景跟你有些相似，只不過她是英國文學出身，出國也是攻讀英國文學，後來卻從事翻譯研究，因此曾以「半路出家」來形容自己。其實，我們這些在翻譯研究成為獨立學科之前的人，所遭遇的情形都很類似。你對臺灣和大陸的翻譯研究的情況也相當熟悉，而香港一直是華人地區翻譯研究的領頭羊，請問是什麼條件促成香港在這方面的優勢？

陳：我覺得香港是這三個社會中最開放的一個，中西書籍、期刊應有盡有，垂手可獲。香港的翻譯研究不一定比臺灣或大陸的更好，但是卻有資料上的優勢。我在山東大學做過一年的研究，跟臺灣學界也非常熟稔，去年在日本關西學院大學也做過訪問教授，所以知道在大陸、臺



圖4 陳德鴻教授（右立者）2012年於香港翻譯學會午餐會發表演說。
資料來源：陳德鴻教授。

灣和日本做翻譯研究有點吃虧，因為資料不易取得。

單：除了資料上的優勢，機構的支持（institutional support）應該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吧？

陳：對，香港這幾個翻譯課程成立了以後，就有了機構的基礎，可以大力發展翻譯這個研究領域。臺灣各大學英文系裡不少的教授也寫有關翻譯的文章，但沒有像我們那麼多專攻翻譯研究的。至於中國大陸，我覺得這些年孕育了很多出色的翻譯研究人才，在廣州、上海、北京等地年輕的一輩應該會青出於藍。去年我去上海復旦大學和外國語大學演講，碰到一些年輕學者，他們發問時一針見血，可真的是能抓到重點。我有一篇講辭，在好幾個地方用中、英文宣讀過，也曾回應了一些聽眾的問題，但是在上海的經驗卻特別深刻。有一個晚上差不多十點過後才講完我的一個研究課題，大家都很累，但學生接連問了好幾個非常尖銳的問題，反省過後，我才恍然大悟，讓我印象很深刻，發問的大概是上海外國語大學的研究生。此外，他們寫的文章水準也提高了很多。事實上，一些現在在香港做翻譯研究或從事翻譯教學的就是從中國大陸來的年輕老師。

單：他們是直接從中國大陸過來？還是在英美或紐澳拿到博士學位再過來？



圖5 陳德鴻教授（左）2013年於中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舉辦的國際研討會發表主題演說。

資料來源：陳德鴻教授。

陳：都有。有一些是來香港唸博士，然後找到工作留下來的。另外一些則是歐洲背景的。香港各大院校訓練的一批從中國大陸來的學生，最近在《翻譯季刊》第七十二到七十五期專輯裡面發表了十多篇論文，他們的水準是有目共睹的。

單：臺灣在這方面發展比較晚，人數也比較少。

陳：臺灣方面我接觸的比較少。不過一直以來，在香港翻譯研究圈子裡也有些臺灣「過江龍」，也就是路過的高手，但近年來還是從大陸來的研究人才比較多。

單：兩岸三地中，香港除了剛剛你提到的風氣比較開放、資料流通方便之外，還有一點就是英文能力的訓練也比較好。

陳：將來的情況還很難說。按我看來，現在臺灣和大陸學生的英文水準都提升得很快，最近一個統計指出香港英文的水平下降，甚至不及馬來西亞、北京和上海，連日本都不如。對這樣的調查結果，香港的反應很大，大家都說不可能，哪裡會連日本都不如！只不過在這些事情上，沒有國家或地區會永遠佔有優勢。我們首先要深入思考這樣的調查的基準是什麼？不同的調查依據的是不同的標準。仔細一看，這個調查比較注重讀和寫。我覺得假如是聽力和會話，香港有其優勢，但若是單談書寫和閱讀，一些鄰近地區確實有可能比香港好，這並不奇怪。我們在香港的人可以把這個看作是個警訊。

單：你對年輕學者或學子有什麼期許？

陳：年紀較長的先驅已做了開拓的工作，有待年輕一代繼承，希望他們能夠把翻譯發揚光大。

八、東西翻譯學界之互動

單：談到與國際翻譯學界的互動，張佩瑤譯注的《中國翻譯話語英譯選集（上冊）：從最早期到佛典翻譯》（*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Volume One,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Buddhist Project*）於二〇〇六年出版，很受國際翻譯學界的肯定。

陳：那個計畫很艱鉅，是她的代表作，涵蓋中國從古到今對翻譯的論述，她未能完成就過世，非常可惜。

單：她在上冊的緒論中除了說明自己如何譯注之外，並帶進 thick translation（厚實翻譯）的觀念，來說明如何落實於這個計畫。另一個特殊之處是，她以自己練習太極推手的陰陽觀念，來闡釋華文世界在面對國際、尤其是西方的話語時，雙方並不是二元對立，而是可以相生相成的。依你之見，那是不是華文世界翻譯研究者與西方主流對話的重要方式？也就是運用自身的傳統去與外來的傳統進行對話？

陳：說得很對。九〇年代香港出現了一批翻譯研究者，包括了張佩瑤。他們當中有多位已經退休或即將退休，下一代的翻譯學者群是怎樣的呢？我們還不知道。我進入這個領域以後，目睹翻譯學科的建立、各大學提供資源讓翻譯研究在香港得以發展，讓翻譯學在九〇年代能在香港開枝散葉。我相信以後不再只是開創性的研究，而兩岸四地應該各領風騷。

單：是的。因此由更寬廣的視角來看，張佩瑤那個譯注計畫在東西翻譯學界的交流與互動中發揮了特定的作用，提供了一個另類選擇。換句話說，在翻譯史和翻譯論方面，國際上原先只有西方的論述，不認識中文這一塊，而她提供的不只是另一個看法，而是另一套知識體系。

陳：的確如此。有些人做研究喜歡深入探討一個點，即所謂「西式」的，但其實還可以有其他的選擇。余英時提過兩種研究風格，以刺蝟和狐狸作比喻，刺蝟集中專一，狐狸涉獵廣而不深，各有各的好處。

我算是狐狸吧。與其長時間鑽研一個議題，我偏好在特定時間內做我感興趣的東西。有時候學者為應付學校要求，以密集、集中的方式工作，文章愈快發表愈好。其實開闊的方式有其價值。

單：你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深切了解他們學院裡的方式。

陳：說來說去就是我們不可以把在美國行得通的那一套當成唯一的標準，而且他們的研究方法也不是一成不變的。

單：你會建議什麼另類的選擇嗎？

陳：另類的選擇就是日本。我不是說要把日本全套東西都搬過來，但是他們可愛的地方就是在東西方兩套標準之間遊移，你當然也可以說他們根本就是關著門做事。

單：昨天在香港科技大學有人提起，日本到國外唸學位的人愈來愈少。

陳：對，年輕人都不想離開那麼舒服便利的環境，在日本住久了根本都不想去別的地方。

單：在臺灣有不少人也會覺得現在的年輕人缺乏國際視野，沒有出去吃苦的決心，好像只願意窩在自己的「舒適圈」裡。

陳：那是不好的。日本政府也留意到這個問題，提供很多獎學金，希望學生們去外國唸書，但年輕人並不踴躍申請。

單：你對於年輕學者有什麼忠告嗎？

陳：我對年輕學者的忠告就是，應該研究與自己的個人生活經驗有關的題目，而不是只跟隨「潮流」。像是在翻譯研究方面，現在已經有太多的碩士和博士論文採取文本分析和比較的方法，討論譯文不忠於原文的程度。我們實在不需要更多這樣的語言分析了！另外一些人則重複引用一些著名的學者，如雷飛維（Andre Lefevere）、哈曼斯（Theo Hermans）、韋紐堤等的理論，生搬硬套，也是非常可惜的。

單：你發掘出自己的興趣，所寫的文章也為國際期刊所接受，很可能是因為你的論述具有他們欠缺的特色，也就是香港學者與國際主流學者互動時的特色。

陳：希望如此。事實上，研究論文還是小眾的讀物。這些文章很多寫得非常好，但不為主流學界所引用，影響力也有限，倒不如在某報紙或雜誌登一篇短小精悍、恰到好處的散文更能發揮影響。這也沒辦法，因為看論文的人只有一小撮，也就是同一個圈子裡的人。當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情況，一些學者真的站出來，要用「小眾」的研究影響「大眾」。像貝克，她的研究就是為巴勒斯坦人爭取權益而做的。她編期刊、發表論文、寫書，一直以來都是探討「翻譯和社會行動」（translation and activism）這個命題。她也身體力行。我聽過她在浸會大學的一次演講，講的是有些中東地區的報刊譯員因為政治目的而在翻譯時篡改、捏造事實，那是多年來我聽過最震撼的演講。她離開了象牙塔，把研究跟社會的需要直接連結起來。

單：你這麼說讓我聯想到兩個人，一位就是史丹佛大學的劉大偉（David Polumbo-Liu），每天在臉書中發表與分享許多則有關巴勒斯坦人受到迫害、美國學界壓迫言論自由、美國的種族歧視等訊息。另一位就是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的巴特勒（Judith Butler），她是猶太裔，但她看到以色列人對巴勒斯坦人的壓迫，勇敢站出，表達自己的立場。這些人真的把自己的學術和人道關懷、政治投入結合在一起。

陳：那要有很大的勇氣。我們寫文章是把心裡想的東西講出來，但因為選的課題並不敏感，所以寫出來不會遭到壓迫，相反地，貝克就遭到很猛烈的攻擊。所以這類學者一方面要很有勇氣，另一方面口才又要了得，能在媒體上侃侃而談，反擊持相反意見的人。像你說的巴特勒就是口才出眾，不單能寫文章，還能講解自己的立場的一位學者。學院中那樣的人不多。

單：的確如此。謝謝你今天接受訪問。

